

张菊生先生七十 生日纪念论文集



商务印书馆

张菊生先生七十 生日纪念论文集

胡适 蔡元培 王云五 编辑



创于1897

商务印书馆
The Commercial Press

2012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/胡适等著. —北京:
商务印书馆, 2012

ISBN 978-7-100-08765-0

I. ①张… II. ①胡… III. ①杂著—中国—现代—选
集 IV. ①Z429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36069 号

所有权利保留。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。

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

胡适 蔡元培 王云五 编辑

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)

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

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

ISBN 978-7-100-08765-0

2012年1月第1版

开本 787×960 1/16

2012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张 34½ 插页 2

定价: 89.00 元

目 次

总 类

中国学术史上汉宋两派之长短得失·····	张君勱	1
历代藏经考略·····	叶恭绰	21

哲 学

《周易》三陈九卦释义·····	蒋维乔	56
《老子》这部书对于道家的关系·····	唐 钺	65
述陆贾的思想·····	胡 适	88
多元认识论重述·····	张东荪	98

社会科学

唐代经济景况的变动·····	陶希圣	132
中国战时应采的财政政策·····	张天泽	144
走私之背景及对抗方策·····	马寅初	169
过去立宪运动的回顾及此次制宪的意义·····	吴经熊	190
己未词科录外录·····	孟 森	223
近代书院学校制度变迁考·····	谢国桢	246

语文学

甲骨文中所见的殷代农稼情况	吴其昌	279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	-----

自然科学

十二辰考	傅运森	315
译刊科学书籍考略	周昌寿	346

艺 术

关于鉴别书画的问题	马 衡	396
南阳汉画像石刻之历史的及风格的考察	滕 固	406

文 学

汪龙庄先生致汤文端七札之记录与说明	蔡元培	431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	-----

历 史

廿五史篇目表	黄炎培	446
西魏赐姓源流考	朱希祖	448
中国文化之回顾与前瞻	韦 憲	498
编纂中国文化史之研究	王云五	511

中国学术史上汉宋两派之长短得失

张君勱

第一 汉宋两派之争执

吾国学术史上汉宋之争，不始于宋，不始于明，而始于清初。盖宋明两朝之理学，以独往独来之气概，自辟径蹊，不独不与汉学家度长挈短；自谓其所得，有超于汉人之上者。此争端之所以不起也。明清之交，顾亭林辈反对王学之空谭心性，以阳明之学，比晋王夷甫之清谭。自是而后，有由王学而返于朱学者，是为程朱派；更有舍理学而专以《六经》为研究之对象者，是为汉学派。汉学自清初迄于清之中叶为极盛之日，“家家许郑，人人贾马”。戴东原除从事于考证之学之外，并及于攻击程朱，于是理学之复活运动又起矣。此运动中之中心人物，则唐鉴曾国藩辈是也。

唐鉴之言曰：

今夫经也者，圣人之至文也；圣人之至文，圣人之至道也；圣人之至道，人人之至道也；得人人之至道以求经而经传；经传而圣人之道亦传。孟子之后，传圣人之道以存经者，朱子一人而已。其他则大抵解说辞意者也，综核度数者也。乃或以辞意之别于今，度数之合乎古，遂至矜耀，以为得所未得，而反

厌薄传圣人之道以存经者，是其所以自处亦太轻矣。秦人有敬其老师而慢其师者，或问之曰“老师衣紫，师衣褐”，或曰：“然则非敬其老师也，敬紫也。”今之遵汉经师而诋朱子者，是亦敬紫之类也，又乌足与校哉？

曾文正之言曰：

近世乾嘉之间，诸儒务为浩博，惠定宇戴东原之流，钩研诂训，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，薄宋贤为空疏。夫所谓事者，非物乎？是者非理乎？实事求是，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？名目自高，诋毁日月，亦变而蔽也。

同时，有方东树作《汉学商兑》一书，举汉学家诋毁宋儒之言，一一从而驳之，以反攻之法为理学张目。此理学复活运动，虽尝发端，然因其中坚人物，参与对抗太平天国之战事，未及开花结实，而先夭折矣。

汉宋双方之主张，可归纳为下列各端：

甲 道之所在之异

汉学家以为求孔孟之道不离乎古经。

例证 戴东原之言曰：“后之论汉儒者，辄曰‘故训之学云尔，未与于理精而义明。’则试诂以求理义于古经之外乎？若犹存乎古经中也，则凿空者得乎？呜呼！经之至者道也，所以明道者词也，所以成词者，未有能外于小学文字者也。由文字以通乎语言，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，譬之适堂奥之必循其阶，而不可以躐等者。”

宋学家以为义理根于心，不必求诸古经。

例证 陆象山之言曰：“尧舜曾读何书？”又曰：“《六经》皆我注脚。”

其稍温和者，则有主张道学问遵德性并重之朱子，其言曰：“大抵子思以来，教人之法，惟以遵德性道学问两事为用力之要。今子静所说专是遵德性事，而熹平日所论，却是道学问上多了。”

《答项平甫书》

乙 道与佛教之关系

汉学家之自贵其学，谓其不为佛说所染，其责宋学也，谓其杂以佛家思想。

例证 阮元之序《汉学渊源记》曰：“两汉经学，所以当遵行者，为其去圣贤最近，而二氏之说，尚未起也。”

戴震曰：“宋以前孔孟之书，尽失其解，儒者杂袭老释之言以解之；于是有读儒书而流入老释者，有好老释而溺其中，既而触于儒书，乐其道之得助，因凭借儒书以谈老释者，对同己则证其心宗，对异己则寄托其说于《六经》。”

宋学家中，虽有习静与觉悟之说，然其目的，在乎立己立人，故去释氏甚远。

例证 王阳明之序《象山集》曰：《象山文集》所载，未尝不教其徒读书穷理；而自谓理会文字颇与人异者，则其意实欲体之于身。其亟所称述以诲人者；曰居处恭、执事敬、与人忠；曰克己复礼；曰万物皆备于我，反身而诚，乐莫大焉；曰学问之道无他，求其放心而已；曰先立乎其大者，而小者不能夺。是数言者，孔孟之言也，恶在其为空虚者乎？独其易简觉悟之说，颇为当时所疑。然易简之说，出于《系辞》；觉悟之说，虽有同于释氏，然释氏之说，亦自有同于吾儒，而不害其为异者，惟在于几微毫忽之间而已。

丙 心性为虚为实之争

汉学家以六艺之文，百王之典为实，其于心性之探索，则目为空谭；反之，宋学家则谓所事切于身心者，方得谓之实。

例证 顾亭林之言曰：“昔之清谭谭老庄，今之清谭谭孔孟，未得其精而遗其粗，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；不习六艺之文，不考百王之典，不综当代之务。举夫论学论政之大端，一切不问，而曰一贯，曰无言，以明心见性之空言，代修己治人之实学；股肱惰而万事荒，爪牙亡而四国乱，神州荡覆，宗社丘墟！”

戴东原曰：“以理为学，以道为统，以心为宗，探之茫茫，索之冥冥，不如反而求之《六经》。”

朱晦庵曰：“圣贤说性命，皆是就事实上说，言尽性便是尽得三纲五常之道，言养性，便是养得此道，而不害至微之理，至著之事，一以贯之，非虚语也。”

陆象山曰：“宇宙间自有实理，所贵乎学者，为能明此理耳；此理苟明，则自有实行实事。”又曰：“千虚不博一实；吾生平学问无他，只是一实。”

丁 方法之争

汉学家既以为求圣人之道，不离乎古经，所以解经者，不离乎文字，故其下手之法，在乎训诂小学；至于宋学家则以为义理自义理，不应求诸训诂文字与典章制度之中。

例证 钱大昕曰：“训诂者，义理之所从出，非别有诸理出乎训诂之外也。”又曰：“训诂之外，别有义理，非吾儒之学也。”

戴震曰：“后世儒者，废训诂而谭义理，则试诂以求义理于古经之外乎？若犹在古经中也，则凿空者得乎？经之至者道也，所以明

道者词也，所以成词者，未有能外于小学文字者也。”

方东树曰：“汉学诸人释经解字，谓本之古义者，大率祖述汉儒之误，傅会左验，坚执穿凿，以为确不可易，如以‘箕子’为‘菱滋’、‘枯杨’为‘姑杨’、‘蕃庶’为‘蕃遮’数百千条，迂晦难通。”“何义门云：但通其训诂，而不辨义理，汉儒之说诗，皆高子也，信乎朱子有言，解经者一在以其左证之异同而证之，一在以其义理之是非而衷之，二者相须不可缺，庶几得之。今汉学者，全舍义理而求之左验，以专门训诂，为尽得圣贤之传，所以蔽也。”

方东树又曰：“至谓古圣贤义理，即存乎典章制度，则训诂以经典所载曰钦，曰明，曰安，曰恭，曰让，曰慎，曰诚，曰忠，曰恕，曰仁，曰孝，曰义，曰信，曰慈，曰俭，曰惩忿窒欲，曰迁善改过，曰贱利重义，曰杀身成仁，反而言之，曰骄泰，曰奢肆，曰苟妄，曰自欺，曰谄谄，曰贪鄙。凡诸义理，皆关修齐治平之大，实不必存乎典章制度，岂皆为异端邪说欤？”

汉宋两派争执之中心问题，不外如上所举。吾人以今日之眼光评之，汉学家所研究者为文字，为名物，谓为近于西方之文字学、考古学可也；宋学家自心性之微处，以求人之所以行己立身，与夫治国平天下之道，其所研究有属于形上学，有属于心理，有属于伦理，简而言之，可称为哲学。一方既为文字学，他方则为哲学，在今日言之，不特不能以甲方打倒乙方，且两方之间，虽欲冲突而不可得。何也？为文字学者，考文字之解释，古书之真伪，与夫名物之由来，何能与以形上学以伦理为对象之哲学发生冲突乎？虽然，双方之争执，起于吾国之古代典籍。一以欲求圣人之道，舍古经莫由，故当从文字训诂下手。一则以为求圣人之道，虽不离乎典籍，然所以判断典籍中之难题者，不能不以心中之义理为断；可知心中之义理，自为判断一切之最后标准。如是言之，所谓汉宋两派之

争，不起于其研究之对象，不起于两种学问之本身，而起于古代典籍之是否代表全部义理，与夫所以了解古代典籍者，应由文字入手，抑另有所谓判断之标准在也与否之问题也。

吾人先将理学之性质解释一番，俾世人晓然理学之所以成立，自有其自强之根据，非汉学家所得而任意推翻。所谓理学之根据有二：一曰思想系统，二曰概念。凡所以成为一科之学者，自有其思想，自有其系统，科学然，哲学然，乃至吾国之理学亦无不然。有天道焉，如所谓太极、无极、理气是。有人道焉，如心、性、情、欲是。自濂溪而后，此学自成一种统系，且确有超出古经之外者。若穷其由来，亦惟曰思想力实为之，与古经之出于古先哲人之心思者一。若必取后人之思力从而否认之，则后人之学将无能出乎前人之上者，此断乎其不可通者也。凡所以成学者，既有其系统，而其为之单位者曰概念，由概念之连贯，而其系统以成。譬之朱子辈之言理，必举孟子心之所同然之言以解释之，而戴东原举木中纹理，或文理密察之言以解释之。一以为理在心，故引孟子之言以说明之；一以为理在外，故以木石为之证验。凡此解释之不同，初不关乎文字，不关乎小学，盖由哲学立场之不同，而理之概念因之以异；即其他概念之异同，亦以此根本立场之异为之根。戴氏虽以文字训诂为护符，实则其所以自成一家言者^{如《孟子字义疏证》²}初非字义之疏证，乃其自创之哲学学说也。读者诚明此二义，可知理学之所以为理学，自有其最坚强之根据，非古经与小学所得而范围之。自今日学术之性质言之，一为文字典籍之考证，一为义理之探求，双方各有其范围，各有其方法，彼此间正不必有所诋诽也。

第二 宋代学术之评价

以上所言乃就清代学者所以排濂、洛、关、闽与为阳明之学者而言之也。吾人更进而穷之，则有应考察者三事：第一所谓宋学云云，如濂、洛、关、闽之理学家，是否不讲考据与训诂之学乎？所谓宋学云云，但以濂、洛、关、闽为代表之说法，对于宋代学术之评判是否公允乎？江藩氏有言：“经术一坏于东西晋之清谭，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。”宋学家对于古经所负之责任，果如是重大乎？此三问题，吾人处今日应以无偏无党之精神，加以研究者也。

江藩氏之言曰：“宋初承唐之弊而邪说诡言，乱经非圣，殆有甚焉，如欧阳修之《诗》，孙明复之《春秋》，王安石之《新义》是矣。至于濂、洛、关、闽之学，不究礼乐之源，独标性命之旨，义疏诸书，束诸高阁，视如糟粕，弃等弁髦，盖率履则有余，考镜则不足也。”

同时，清代汉学家所主持之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亦有言曰：“洛、闽继起，道学大昌，摆落汉唐，独研义理，凡经师旧说，俱排以为不足信。”

此江氏与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之言，自吾人今日观之，不可谓为持平。盖一时代之精神，汉代学者，以守家法为务，此汉代之精神也；宋代学者，读古人书，求发前人之所未发，此宋代之精神也。当清人以汉代为宗之日，自然以恢复汉人成法为唯一能事；然就学术之进步言之，则发前人所未发之举，安得而一概抹杀？朱子尝序《吕氏家塾读诗记》曰：

唐初诸儒作为疏义，因为踵陋，百千万言，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^{指毛、郑而言}之区域。至于本朝，刘侍读，欧阳公，王丞相，

苏、黄与河南程氏，横渠张氏，始用己意，有所发明，虽其浅深得失，有不能同，然自是之后，三百五篇之微词奥意，乃可得而寻绎，盖不待讲于齐、鲁、韩氏之传，而学者已知《诗》之不专于毛、郑矣。

魏安行序孙明复之《春秋尊王发微》曰：

《六经》皆先圣笔削，而志独在于《春秋》者，赏善罚恶尊天子而已矣。奈何传注愈多，而圣人之意愈不明？平阳孙明复先生，奥学远识，屏置百家，自得褒贬之意，立为训传，名曰《尊王发微》，其词简，其义明。

自清代言之，以宋人之摆落汉唐为非；自宋代言之，则以不出前人范围为陋，而以始用己意有所发明，屏置百家，自得褒贬之意，为高。可知一时代有一时代之风气，安可以甲代为定是，乙代为定非乎？

吾人姑让一步言之，治经者不应有所发明，应以守古人成法为务，应从训诂考证为下手法门，则朱子于此，可以比美清代汉学家而一无愧色！陈东塾于其《读书记》中，列举朱子尊重汉学之说，兹引二三条为之证：

朱子《论语训蒙口义》序云：“本之注疏以通其训诂，参之释文以正其音读，然后会之于诸老先生之说，以发其精微。”

《学校贡举私议》云：“其治开也，必专家法。天下之理，固不能外于人之一心；然圣贤之言，则有渊奥尔雅而不可以臆断者，其制度各物，行事本末，又非今日之见闻所能及也；故治经者，必因先儒已成之说而推之。借曰未必尽是，亦当究其所以得失之故，而后可以反求诸心，而正其谬。此汉之诸儒，所以专门名家，各守师说，而不敢轻有变焉者也。”

惟朱子之立论如此，陈东塾乃曰：“朱子自读注疏，教人读注

疏，而讥深不读注疏者。……近时读注疏者乃反訾朱子，皆未知朱子之学也。”此可谓持平之论矣。

清代汉学家阎若璩之《古文尚书疏证》，群推为大著也，然《古文尚书》之伪，朱子《语类》中已屡言之矣：

《尚书》孔安国传，此恐是魏晋间人所作，托安国为名，与毛公《诗传》大段不同。今观序文亦不类汉文章，如《孔丛子》亦然，皆是那一时人所为。

某尝疑孔安国书是假书，如毛公诗如此高简大段，争事汉儒训释文字，多是如此，有疑则阙，今此确尽释之，岂有千百年前人说底话，收拾于灰烬屋壁中，与口传之余，更无一字讹舛，理会不得。兼小序皆可疑，《尧典》一篇，自说尧一代为治之次序，至让于舜方止，今却说是让于舜后，方作《舜典》，亦是见一代政事之终始。却说历试诸艰，是为要受让时作也。至后诸篇皆然。况先汉文章重厚有力量，今大序格致极轻，疑是晋宋间文章；况《孔书》至东晋方出，前此诸儒，皆不曾见，可疑之甚。

然汉儒以伏生之书为今文，而谓安国之书为古文，以今考之，则今文多艰涩，而古文反易平，或者以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，晁错时失之，则先秦古书所引之文，皆已如此。或者以为纪录之实语难工，而润色之雅词易好，则暗诵者，不应偏得所艰，而考文者，反专得加所易，是皆有不可知者。至诸序之文，或颇与经不合，如《康诰》、《酒诰》、《梓材》之类；而安国之序，又绝不类西京文字，亦皆可疑。独诸序之本不先经，则赖安国之序而可见。故今别定此本，一以诸篇本文为经，而复合序篇于后，使览者得见圣经之旧，而不乱乎诸儒之说，又论其不可知者如此，使读者姑务沉潜反复，平其所易，而不必穿凿

傅会于其所难者云。

朱子对于《诗》不信毛序，其言曰：

《诗序》之作，说者不同，或以为孔子，或以为子夏，或以为国史，皆无明文可考；惟《后汉书·儒林传》，以为卫宏作《毛诗》序，今传于世，则序乃宏作明矣。然郑氏又以为诸序本自合为一编，毛公始分以置诸篇之首，则是毛公之前其传已久，宏特增广而润色之耳。故近世诸儒多以序之首句为毛公所分，而其推说云云者，为后人所益，理或有之。但今考其首句，则已有不得诗人之本意，而肆为妄说者矣，况沿袭云云之误哉。然计其初，犹必自谓出于臆度之私，非经本文，故且自为一篇，列附经后；有以尚有齐鲁韩氏之说并传于世，故读者亦有以知其出于后人之手，不尽信也。及至毛公引以入经，乃不缀篇后，而超冠篇端，不为注而直作经字，不为疑词而遂为决词。其后三家之传又绝，而毛说孤行，则其抵牾之迹，无复可见。故此序者，遂若诗人先所命题，而诗文反为因序而作，于是读者转相尊信，无敢拟议，至于有所不通，则必为之委曲迁就，穿凿而附合之，宁使经之本文縻戾破碎，不成文理，而终不忍明以小序为出于汉儒也；愚之病此久矣。

此亦可谓疑古精神之至显者矣！奈何汉学家于清儒则扬之，于宋人则抑之，何其尺度因人而施之不同至于如是乎？

况乎就朱子所注《四书》，其尊重汉儒之注，随在可见。陈东塾《评论语集注》云：“朱子集注，多本于何氏《集解》，然不称某氏曰者，多所删改故也。……”读朱注者，皆不读《集解》，遂不知朱注所自出矣。友人姜忠奎近作《中庸郑朱会笺》，比较两家之注，谓朱注多与郑注合，且言郑朱非两不相容之军垒；可知江氏所谓“义疏诸书，束置高阁”之语，断不适用于朱子矣。

吾人由此可以定宋人对于古经埋没所应负之责任矣。清儒之所深恶，则为汉儒所注古经之湮没，江藩有言：“《易》用辅嗣而废康成，《书》去马郑，而信伪孔，《穀梁》退糜氏而进范宁，《论语》则主平叔。”此三十余字，江氏对于孔冲远、朱子奢之定讞也。旋又继之以词曰：

宋初承唐之弊，而邪说诡言，乱经非圣，殆有甚焉！

汉儒各经所以寝微之故，试略为之考订，则宋人对于各经之态度可知矣。《易》之为书，王弼始有新解；王氏学说之所以流行，《四库总目》论之曰：

《易》本卜筮之书，故末流浸流于谶纬，王弼承其极弊而攻之，遂能排击汉儒，自标新学。

可知康成之《易》之所以废，属于晋人之事，与宋儒无涉。至宋时，况有《周易郑康成注》，出之王应麟之手，早于惠栋《郑氏周易》者约有五六百年之久。《书》之《伪孔传》，始于晋而盛于唐，独有朱子始起而疑之。至阎若璩严今古文之辨，而《古文尚书疏证》以成。可以证朱子之无负于古经。《春秋》三传之学，江藩氏尝谓“至唐赵匡啖助陆沈始废传谭经，而三传束置高阁，《春秋》之一大厄也。有宋诸儒之说《春秋》，皆啖赵之子孙而已”。窃以为所以治经者，不外求圣人之义法，与其求之于释经之传，何如直接求之于经？此亦人心之趋向有必至者，不足怪也。宋之治《春秋》，有谭经者，有求诸传者，不能一概而论，兹以叶梦得书证之。叶梦得著《春秋传》，以孙明复之《春秋尊王发微》，主于废传以从经，苏辙《春秋集解》，主于从左氏而废《公》、《穀》，故其书以参考三传为本，其自序中，先述《春秋》之性质曰：

夫《春秋》者史也，所以作《春秋》者经也，故可与天下通曰事，不可与天下通曰义。左氏传事不传义，是以详于史而事未

必实，以不知经故也；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传义不传事，是以详于经而义未必当，以不知史故也。由乎百世之后，而出乎百世之上，孰能核事之实，而察义之当欤？

于是叶氏自答之曰：“不得于事，则考于义，不得于义，则考于事，事义更相发明。”是以叶氏书之并重三传明矣。他若胡文定之《春秋》传通例通旨，事案《左氏》，义取《公》、《穀》；刘敞之《春秋传》，吕大圭之《春秋或问》，皆参用三传之文，可知宋代初未尝废谈经。若以合三传而一之，视为不合于汉朝治经家法，则又另为一事矣。至于所谓《论语》则主平叔，自为唐人之事，然于下文“宋初承唐之弊”一段中，竟将朱子对郑赵两家之推崇，绝无一字表而出之，可知其所以抑之者惟恐不力，其有可以表彰之者，则置不复道。至于欧阳修之《诗本义》，江藩以为不祖毛公之第一书，其言曰：

自汉及五代未有不本毛公而为之说者，有之，自欧阳修《本义》始，于经义毫无裨益，专务新奇而已。

然欧阳文忠公之序曰：

后之学者，因迹先世之所传而较得失，或有之矣；使徒抱焚余残脱之经，张于去圣人千百年后，不见先儒中间之说，而欲特立一家之学者，果有能哉？吾未之信也。

可知欧阳文忠公亦主张穷竟先儒之说，未尝以新奇为专务也。吾人自大体观之，宋儒自义理以求通经，反之于一己之身心，故各经经其解释之后，令读者殊觉其亲切有味，乃能使千百载以前之经书，与今日之人心发生关系，其为有补于学术，复何待论？即其持论有与汉儒不相符者，亦出于发明义理之苦心，不得目为“乱经非圣”！盖不守汉儒家法，何能与“非圣”混为一谈乎？

窃以为评论宋儒之得失，当就其对于学术全部观之，乃可达于公允。若如江藩氏以汉代学说之存否，定宋人之功罪，则宋代对于